

武汉文史资料文库

WUHAN

武漢文史資料文庫

WENSHI ZILIAO WENKU

第二卷

(政治军事)

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漢文史資料文庫

WUHAN WENSHI ZILIAO WENKU

第二卷

(政治军事)

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沦陷时期的湖北省汉奸组织·····	张范民(1)
武汉沦陷时期汉奸政权的演变·····	秦特征(24)
武汉沦陷时期日军特务部的一些情况·····	袁范宇(39)
武汉沦陷时期的日寇宪兵队·····	张维清(47)
汉奸熊剑东和黄卫军·····	朱绍文(59)
伪共和党内幕·····	程 华(72)
日寇血洗林家大湾纪实·····	欣 舟(77)
日寇烧杀汉阴山惨状·····	尹志异(84)
王家河“七一九”惨案·····	彭绍武 王学其(86)
沦陷后的汉口难民区·····	秦特征(92)
驰骋襄南,威慑武汉·····	张执一(97)
三打侏儒山,全歼伪一师·····	张 斧(116)
李汉鹏伪八军的覆灭·····	宋仁善(132)
一支叛顽伪军策反记·····	许大鹏(138)
日本投降后武汉日伪动态纪要·····	张孟青(165)
战后日侨的集中管理·····	刘崇德(179)
武汉地区对日总受降官孙蔚如·····	徐怨宇(189)
“四大金刚”之一的自述	
——回忆在武汉“劫收”的前前后后·····	徐怨宇(192)

抗战胜利后的军统武汉办事处…………… 鲍志鸿(230)
 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对美蒋的斗争

…………… 郑绍文(247)

利用美国新闻处给五师送情报的回忆…………… 陈 枫(257)

解放前汉口市的各种选举见闻录…………… 程立顺(266)

汉口市改制特别市的经过…………… 吕煊芬(270)

参加国民党“国大会议”实录…………… 胡楚藩(278)

“六一”惨案纪实…………… 吴仲炎(290)

彭善、朱怀冰在武汉的活动与朱鼎卿组府的经过 …… 郑桓武(308)

张笃伦、朱鼎卿的去来 …… 刘鸣皋(318)

解放战争时期武汉市委地下革命斗争概述…………… 曹 惇(322)

中原局组织部城工部在武汉的斗争概况

…………… 城工科座谈会集体回忆(367)

江汉军区域工部在武汉解放前地下工作的一页…… 余 杰(400)

中共鄂中地委城工部在武汉的地下斗争…………… 邱肱良(428)

白崇禧在武汉解放前夕的阴谋…………… 吴相和(453)

军统在武汉解放前夕的应变内幕…………… 刘 非(459)

解放前夕中统在武汉的内幕种种…………… 徐 行(471)

武汉“和平运动”始末记…………… 艾毓英(491)

从“和平运动”到武汉解放…………… 喻育之(512)

武汉解放前夕我们是怎样对“三府”“两局”进行策反的

…………… 张武训 谈 斌 吴先铭 郑桓武(526)

我在武昌金口起义的经过…………… 张 轸(549)

为解放武汉与党共同战斗的岁月…………… 陶述曾(564)

武汉民建在解放前后的活动…… 华煜卿 贺尔梅 金斌统(568)

解放前我的政治立场的转变·····	李崇淮(577)
我参加民革在武汉的地下活动·····	程一新(581)
回忆民盟迎接武汉解放的活动·····	杨春波(592)
农工民主党在汉口的地下活动·····	陶斯元(599)

沦陷时期的湖北省汉奸组织

张范民*

从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时起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时止,7年之中,在日本侵略军的直接操纵之下,以武汉为中心袍笏登场的汉奸政权,前后换了三套人马:第一期是以计国桢为首的反动商人、地主组织的“武汉治安维持会”;第二期是由北洋军阀余孽和反动政客成立的日伪省、市政府,其中又可分为以清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第十三子张仁蠡为首的日伪武汉特别市政府系统,和以军阀时期曾任湖北省省长何佩瑒为首的日伪湖北省政府系统;第三期就由汪伪国民党亲自出马,先后派来了杨揆一和叶莲作垂死挣扎,直到土崩瓦解为止。本文着重叙述二、三两期日伪省政府部分,对于日伪市政府方面,仅就与省发生关连者略加涉及。

日伪湖北省政府成立以前的何佩瑒

何佩瑒是湖北建始人,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据他后来自称是日军中将坂垣征四郎的同期生。在1920年前后,曾在北洋军阀湖北督军王占元属下充当参谋长,受到王的赏识,让他当了幕僚式的湖北省长。王占元下台以后,他也默默无闻地做了20年的汉上寓公(他的寓所就在汉口黄兴路,当时属于法租界)。随着维持会这一短期过渡形式的临近结束,他也跃跃欲试,和他的儿女亲家石星

* 作者系伪湖北省政府秘书。

川一起参加傀儡人选的角逐。石星川也是留日士官生，湖北阳新人，辛亥革命以后湖北新军受到北洋系的排挤而趋于消灭，但石星川仍得黎元洪授以将军府将军的空衔。湖北这类将军很多，人称“将军团”，他们凭藉这一头衔，插手一些地方企业，贪图享受，直到北伐以后，才消声匿迹。何、石两人的斗争，何较占优势，因为石很庸懦，何则狡猾得多。

可是，当时的日本侵略军还不想把赌注下在这两个昏庸老朽身上，宁愿从北方找一个老牌汉奸，曾在冀东伪政权里充当过县长的张仁蠡来充任首任的日伪武汉特别市市长。张是当时伪满大臣张燕卿之弟，是日寇信赖的人，年龄较何、石两人都小，他的父亲张之洞清末任湖广总督多年，在武汉推行过新政，兴办过一些官营企业，是一个和武汉有关系的有名人物。张凭藉这种簪缨世族的声势，何佩瑢、石星川之流也小看他不得。结果在日伪市政府的整个建制里，设置了一个非驴非马，无权无责，但体制似乎很高，薪水着实不小的所谓“参议府”，何取得了议长一席，石也成为副议长，事实上这个参议府奠定了何佩瑢个人下一步卖身投靠的起点。

何佩瑢在担任参议府议长后，就着力进行两步工作，首先由他提名网罗了一批地方上著名的老政客和土豪劣绅充当参议府的参议，这些人大部分是湖北人，但也还包括少数的湖南人和江西人（如谭道南等）。这时江西方面九江和南昌已经沦陷，南浔铁路沿线有几个县的县城也被占了，湖南方面临湘、华容、南县，也成为日寇出出进进之地。何在参议府里收容了这两省的土劣，就是投合日本军方的意向，表示他对于华中三省收拾局势的能力。

其次，何还看中了一点，即日军占领汉口以后，一方面面然还在继续和蒋介石作和谈的试探，但另一方面又在沦陷区内禁止国民党的活动。为了抵销国民党的势力，日本军人曾经想尽方法，搞一些党派组织，武汉地区也曾搞一个小型的似乎是群众组织一类的东西，如“东亚青年联盟”等，可是这些组织号召力太小，在政治

上起不到什么作用,要想另起炉灶地像华北搞一个“新民会”,一时还凑不起这一副班子。何佩瑒于是向日军献策,要重建所谓的“共和党”。原来袁世凯任大总统初期,两湖方面曾经以当时湖北省议会议长汤化龙等人为核心,拥戴所谓首义元勋副总统黎元洪为首领建立了一个名叫“共和党”的政党,尽管“共和党”并不反袁,但在袁世凯的统治下不久就瓦解了,何佩瑒当时在“共和党”里只不过是二流人物,可是现在他却想出借尸还魂的妙着。这计划也得到华中方面日军的赞许,当时华中方面日本军还须听命于南京方面的司令部,这计划送到南京以后,南京日军考虑到对国民党的和谈关系,主张慎重,因此只允许何佩瑒秘密地进行筹备工作。何也在“共和党”问题上向日寇的特务部要了一笔筹备费,这笔款项的来源就是汪伪中央未接管以前武汉方面关于食盐和鸦片专卖收入的结存,这笔款项当然主要由日军方面攫取,但何佩瑒和日伪市长张仁蠡也以各种名目进行了分赃。

何佩瑒这些作法,投合了日本侵略者的意图,日方就决定了省市分治计划,在特别市政府之外,另设一个湖北省政府,让何佩瑒一试身手。

日伪湖北省政府的成立

1939年末,何佩瑒就把参议府议长让给他的儿女亲家石星川,而自己就袍笏登场,奔向武昌,就任日伪湖北省长。旧式官场通例,主官上任之日,一定要出一张红色告示说明“奉……令”或“经……推选”,这样才能表明权力从那里得来。他这个省长,既没有经上一级的中央政权“特任”一下,又不便说明是由日本人委派,也不好像张仁蠡一样找一些流氓地痞当场拥政一番,这红告上如何才能“奉天承运”呢?何想到这一问题很费踌躇,还是由内定日伪省政府秘书处秘书主任贺遐昌替他解决了这个难题,贺建议采用辛亥革命时某些地方宣布独立时,都督所出红告的办法,直接用“本省

长于某月某日就任”。这样，日伪湖北省政府就产生了。

何的日伪省府的全班人马是秘书长张若柏(原参议府秘书长)、民政厅长汪运(老官僚)、财政厅长刘泥清(原日伪特别市政府税捐总署署长)、建设厅长宋怀远(何的日文翻译,原来是平汉铁路局职员)、教育厅长徐慎五(某日本洋行的职员)、警务处长王寿山(抗战前汉口特二区警察总署署长)、保安处长孙基昌(北洋军阀的余孽),以后又加添宣传处(处长吕东荃原在河南任伪职)、社会运动委员会(由国民党人刘某任主任委员)。日伪省政府设在武昌,因此武昌就在事实上从武汉特别市的范围内划归省府管辖,因而武昌公安局(局长陈宝方)和水上公安局(局长姜质生,姜因是张仁蠡一派,不久去职,由船舶管理局局长李志三接任,船管局也合并于水警局),也都转移管辖了。原市政府辖的伪法院系统,以后也改归省辖,高等法院院长周鸿俊(原国民党高等法院推事)、高等检察署首席检察官饶光荣(原国民党武昌地方法院推事)、汉口地方法院院长胡旭莽(原在汉口充律师)、首席检察官鲁参(原地院书记官)。

上面这班人马还几经变动,秘书长张若柏在1940年5月调任财政厅长,由贺遐昌接充秘书长,财政厅长刘泥清因为与何在税局问题上发生利害冲突去职,由张若柏接任,张在接任的次日遇刺身亡,由教育厅长徐慎五接任,后又由陈维政继任(云南大理人,日本文理科大学毕业生,是当时日军汉口特务部长落合甚九郎少将的秘书,据传他的妻子是落合的姨侄女)。教育厅在徐慎五调走后由黄实光(台湾人,时充汉奸报纸汉口《大楚报》总编辑)接任,后来又由日本方面推荐何庭流(在京沪一带活动的青年党人)接任,警务处长由日本方面推荐王达(据传是东北军军官投降日军的)接任。

从1939年底日伪省政府成立起,到1942年初何佩珞因急病身死时,两年多期间内,何佩珞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以下的几件事:

(一)设立厘金局,在当时日伪省府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力搜刮。当时日伪省府号令所及之地,只是武昌市区和武汉附近有限的

几个关卡。日伪省府一成立，马上设立了五个厘金局——美其名曰“产销营业税局”，局长吴某、魏某、李某等。他们有的同何具有暧昧不可究诘的裙带关系；有的是过去办厘金的老手。这些局名义上属于财政厅，实际上是何的心头肉。第一任财政厅长刘泥清就因为要插手分肥而为何所免去的。当时这些关卡附近并不是真正能由何控制的地方，所谓“鸡杂鸭杂”各种恶势力还多得很，设了这些局，当然添了一重剥削，人民更是苦不堪言。

(二) 成立省市财政委员会。当时武汉的肥缺是盐烟两局，按国民党政府的体制说，这都不属于地方收入系统，日伪省府成立前，日伪特别市政府等于是代行了中央一级政权的职权，现在省府成立了，岂肯坐失机会，但是日本军人也早就看到这一点，把这两局拨到特别市政府的建制以外。原任盐政局长孔楚材，因为张仁蠡一系的色彩太浓，就改任日伪市府的财政局长，而由原在何佩瑒下而搞了几天省保安处副处长的李炎汉接任局长。表面上何占了一些优势，可是省府在行政上管不着盐政局，李炎汉事事听命于特务部，有了靠山就不买何的帐了。这时石星川也曾活动想把所谓中央税收机关暂时归参议会管辖，但石的活动力很差，参议会固然可以说是一个不省不市的中间机关，但顾名思义，总像一个立法或咨询机关，不好管这黑白两项财源。在1942年5月间，何佩瑒和张仁蠡暂时达成一项临时协定，双方共同组设一个“省市财政管理委员会”，由省财政厅长和市财政局长担任委员，委员以下分设总务、税务、收支、审核四个股，省市各派两个股长。当然这种毫无缓冲的两头制，只会产生一连串的争执，不久这委员会就撤消，此后何和张都无法染指两局了。

(三) 企图攫取各县的伪政权。湖北省这时已有不少的县份沦于寇手——其中有许多只是县城沦陷，再加上暂时归湖北省政府管辖的江西、湖南几个县，加在一起，日伪省府的管辖区也算不小了。可是这些县的伪政权都是先于日伪省政府而产生的。省政府

成立以后，这些地方就将“维持会”改称“县政府”，实际上他们一切听命于当地的日本警备队。当时一般日伪县长（如孝感朱坤宇、大冶张宜臣、江陵周仁等），都是深得日本军人欢心的当地劣绅，对何简直不买帐。何费了很大的力量，掉换了一个黄陂县的日伪县长谢鹤，这才争取到别的县长对他稍稍敷衍一下。

（四）组织昙花一现的“共和党”。何佩瑢组织“共和党”的秘密，已如前所述，它一直在筹备中，只是为了顾虑到南京汪精卫的关系，没有正式公开。他筹建“共和党”只是藉这名义揽权分肥而已。1940年是所谓恢复“共和党”的顶点，在汉口珞珈山路（现珞珈山路）何的官邸内，这些内定的总裁（何本人）、副总裁（湖南政客谭道南，何心目中的华中政权成立后的湖南省长）、部长（蔡森、谢鹿萍等），日夜围着鸦片盘子在那里“建党”。何当时决定用辛亥革命后黎元洪都督府所用的旗子（即后来北洋政府所采用的陆军旗，北伐前湖北省铸造的大铜元也有这旗子的形象）为“共和党”旗，并打算将日伪省府各机关职员全部作为“共和党”基本党员。但在1940年下半年，就进行得不很积极，据说是由于张仁蠡向汪精卫告密，汪又转向日方提出交涉，南京方面日军部要武汉日军采取慎重态度的缘故。到了1940年，这个重建“共和党”就在筹备中夭折了。何当然是不甘心的，此后他还一度在“东亚联盟”这个组织上用了一些工夫。这个组织标榜着“政治独立，军事同盟，文化沟通，经济提携”四大纲领，这都是日本人搞的无聊玩意，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何除了把“共和党”的上中层人员安插了几个在里面以外，也无法从中变出任何戏法，不久这个组织也就消声匿迹了。

（五）企图压倒张仁蠡。何佩瑢和日伪武汉市长张仁蠡的明争暗斗一直在继续着，何处心积虑想得到华中伪政权领袖地位，以便取得对张的领导权。但日军在湖南、江西两省很久不能前进，三省政权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江西的地方汉奸政权中，如南昌市日伪市长万熙（留日生，娶一日本女人为妻），还时时有不服湖北省政府来

管的表示。而何的得意杰作“共和党”，又因汪伪的反对，而逐渐消失下去。何的华中政权妄想，自知无法实现，他就转而向日本军方提出市政府改归省辖的意见。原来他看到日本军人当时还不愿让汪伪势力顺利地统治武汉，武汉方面假如只有一个政权，还可以搞点半独立，现在省市并立，两方之间有些关系必须有一个上一级的政权来作决定，同时还有双方互争不下的中央税收问题，这些都使南京汪伪有词可藉。何于是提出“省市府合并”的计划，实际上就是用省来辖市。张仁蠡看透这一点，就一反过去对汪伪不通往来的作法，而作出一些对汪真诚的态度。张在来汉不久，曾经写信给住在北京的旧日上司傅增湘（号沅叔，在北洋军阀时期曾任教育总长，是一个有名的藏书家，张过去曾在教育部任佥事，是傅的下属），说明想在湖北刻一部丛书，请傅提出一些进行方法的意见。傅回信给他介绍汉口的藏书家徐行可，建议他就近请教，张就派参事徐海锋到徐家拜访，想看看徐家的一些精钞本，知道了徐家藏书中有的一部清末名士文廷式所著《纯常子枝语》手写稿40册（文廷式是清末探花，珍妃的老师，原籍江西，侨居广州，汪精卫对他很推崇），张因以2000元军票向徐家买得这部手稿的抄本，送给汪祝寿，这是在1940年汪、张第一次发生联系时张所认为最得体的进见礼（汪对这项礼物极其重视，不久就用双照档名义刻版印行）。后来张又在日本人所许可的范围内，略略放松国民党在武汉市的活动，与汪伪社会部有关系的国民党人谢伯进也被任为武汉市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样汪伪本身势力没有进入武汉前，也就对张仁蠡予以几分支持——至少在张、何关系上还是并立的。

何佩瑒在1941年下半年的一段日子很不好过，他的如意算盘“共和党”、产销营业税等等，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眼看各县日伪政权搜刮的民脂民膏，无从问津，在日伪省府内，用人行政之权又几乎全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原来日伪市政府和日伪省政府除了由日本特务部作总的操纵人以外，各个部门都配有日本顾问和

嘱托,掌握实际权力。在日伪省府里,由于何佩琚的昏庸,遇事逢迎日本人的意旨,这班顾问、嘱托,更是气焰万丈,例如教育厅的顾问市木,简直不把伪厅长黄实光放在眼下。秘书处的宫本,虽然地位上只是一个嘱托,也常常指挥着秘书长贺遐昌。何的嫡系只剩下一个老朽的民政厅长汪诤,还有一个建设厅长宋怀远,虽说和日本人搭上了关系,总还算是他的翻译,此外财政厅长陈维政是特务部长落合甚九郎推荐的,这人对何还很恭顺。最可恼的宣传处长吕东荃、教育厅长何庭流、警务处长王达3人,他们都是新近由日本特务部中层当权人物由外地找来硬塞给何的,他们关系密切,行动一致,传说他们之间有个“青年党集团”,准备把日伪省府的领导权拿到手里,必要时取何而代之,何对他们心存畏忌,但又无可奈何。

为了打开何与各县之间的关系,1942年春节后不久,何“出巡”大冶,几天以后在大冶得了急病,赶回武汉后,很快就死了。

汪记推管湖北日伪省府

何佩琚一死,在汪精卫方面,派什么人来充任这个遗缺,倒不是很困难的问题,他所拼凑的一副南京日伪国府的班子里,有两个这样的人选:一是叶蓬;一是杨揆一。他们都是湖北人,都一向在湖北做官,都是军人出身,而又是长期充当参谋人员,善于搞小动作的人(叶是湖北军阀夏斗寅的参谋长,杨也曾充湖北军阀何成潜的参谋长)。杨揆一很早就走了陈璧君的门路,一等接管湖北日伪省政府的问题发生,汪就以和日本军人推好关系为理由派杨接任。(叶蓬在1935年任汉口警备司令时期,曾经在汉口循礼门的司令部内设置日本军人形象的枪靶,经汉口日本领事提出抗议,当时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撤换了叶的司令职务,日本人称这为“人形事件”。沦陷后叶蓬投伪事敌,曾由汪伪在1941年派叶来武汉组设绥靖公署,但局面不能打开,不久就回南京去任汪伪陆军部长。有此一段渊源,在1942年日本军人气焰还很嚣张的时候,汪精卫也无

法提出叶来接任湖北省长。)

杨揆一是在1942年3月间到武汉的,汪伪为了这位新耳目,给了他全副“仪仗”,他是省长兼省保安司令,还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又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资格被授权来指导省、市党部。他带来一批当厅长、局长、县长的人物,准备大批出笼,可是不能带来一支军队。

汪伪原意本想把武汉方面的一切重要安排,在南京和日本侵略军总头目协商决定,但日本方面,坚持就地解决,汪精卫既然急于取得湖北地盘,也就不敢过多地讨价还价。杨揆一这次到达武汉,最重要的使命实际是代表南京汪政权和武汉日本军人进行交涉。其结果,日本军人答应了这么几点:

(一)日本军方所收编的伪军,名义上属于武汉行营管辖,用行营所给的番号。各县由日本驻军指挥的小量杂色队伍,改为保安队番号,归省保安司令部管辖,但人事权、指挥权一律照旧,行营和保安司令部事实上无权干涉。杨揆一也承认不在湖北招兵买马。

(二)各县都可以悬挂附有黄色三角飘带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三)对已经成立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活动范围可以稍稍放宽,但不作发展活动。当时的省党部采取常委负责制,由钱昌义、谢伯进(号盛勘)、李藩昌(号寿卿,天门人,老同盟会会员)3个常委负责。因为实际上无事可干,杨揆一也懒得去指导(1943年以后,伪省党部就改为主任委员制,由南京伪国民党中委、当时的日伪湖北省教育厅长黄大中任主任委员,但同样是无事可做)。各县也一律在日伪县长的领导下,挂起县党部的招牌(有些县就由日伪县长兼任县党部主任委员,不问那些县长是否具有国民党党籍)。

(四)财政方面,还是在南京由周佛海通过日本派来的国民政府最高经济顾问交涉的。关于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分行的设立和储备券的流通,本是出于日本人本身的计划,所以进行很顺利。以汉

口为中心的盐烟专卖和统税收入，纳入中央税收系统，由伪财政部派一个鄂赣湘三省财政特派员驻在武汉（特派员王震生、特派员公署设在汉口黄陂路）。实际上关于盐烟统三局的人事和行政，还是日本特务部直接管辖，所谓特派员公署，只不过是一个记帐和分取一部赃款的机构而已。

（五）对于省政府的人事问题和各县县长的人选，日本军方原则上承认由省长决定，但应和特务部协商，县长还应经过特务部征得当地日本驻军的同意。如果驻军推荐新县长，也须经过省政府同意后发表。

（六）从特别市政府成立直到何佩珞的湖北省政府每个厅局，原来都有一个顾问和嘱托，顾问实际上是这个机关的太上厅长。有些机关竟至于一切重要公文都要经过顾问同意盖章，才能生效，这样使得那些厅局长有时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杨揆一对这些七手八脚的控制人，也感到难于应付。经过多次交涉，日本人算是答应了取消顾问一级，只保留若干嘱托，算是中国政府聘用人员，这些嘱托的职权，一般也只限于提出意见，通风报信等。此后对市政府也同样取消了顾问，而由特务部的第一课长担任省、市政府的总顾问。

日伪省府的日本顾问虽然取消了，可是日本军人的权威仍然是高于一切。例如，1943年间，日本侵略军曾经统一制定了当时各县日伪县政府应拨交当地日本驻军的粮秣数量。以前这本是由驻军分别直接命令伪地方机关照缴，这一年根据杨揆一代表汪伪中央和汉口日本特务部事先交涉的结果，这一类重要事项都应经由特务部向日伪省政府提出再分令各县照办。特务部就派人持密件要省政府立即转令各县。杨揆一对这事很感为难，立即照办吧，似乎毫无代价地替人负下这么大的责任，有些犯不着；不予照办吧，又会被日本人认为没有合作的诚意。时间紧迫，没有向汪伪请示或进行研究磋商的余地，杨揆一只得把特务部的来文交给秘书长吴

明浩去办。吴明浩当时不愿负这责任，就建议交财政厅办理，因为财政厅长陈维政是人所共知的日方推荐人员，交给他就可以推卸南京派的责任，同时也是对日本军人的要求“欣然同意”的表示。陈维政当然也知道杨的用意，但他还是接受了。他吩咐管理赋税的第二科长李永楨拟办通令各县的文稿，李说这是特交文件，并不属该科职责范围，他就要四个科长共同负责。后来别的科长都认为这倒与民政厅的职掌有关，陈因此向杨说明，财政厅可以奉令拟稿，但希望民政厅会同办理。结果由财政厅第二科科员夏某到秘书处去办稿，由秘书处负责转发，（因为是密件，所以拟稿直到缮发都集中一处办理）稿面上主管科一栏盖上了民财两厅全部科长的八个名章，厅长一栏盖上汪书诚和陈维政两人的章子，吴明浩也以秘书长的地位核稿盖章，杨揆一当然不能不划行。事后吴明浩叮嘱秘书处把来文和会稿一起封存，在封面上亲批“绝密！此卷非经秘书长核准，不得调阅”。他们用了许多气力，好像做了一件大事似的，可是事实上各县的日本驻军早已直接命令当地的汉奸政权照办，完全用不着杨揆一的马后炮。以后日军对于这类事项，就干脆不再通过日伪省政府，杨揆一也不再强调他的发号施令之权了。

杨揆一的大杂烩

杨揆一上任后，在人事上任命秘书长蒋镇东（日语翻译），民政厅长汪书诚（湖北老官僚），建设厅长关麟书（保定军官学校出身，湖北荆州驻防旗人，和杨同是何成濬部下军官，曾任行政专员），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袁某（北方人，经历不详），经理处长是何成濬的外甥吕渭林（杨以前长期任何成濬的参谋长，这次重用吕某是藉以和何成濬保持联系）。原来由日本方面推荐到省政府的财政厅长陈维政、教育厅长何庭楨、宣传处长吕东荃、警务处长王达都留任原职。在武昌设有一个市政处，处长是刘立藩（湖北旧军阀刘佐龙之子，日本士官生），也是日方关系而由财政厅科长外调任职的。

杨为人贪财好色，生活腐化到了极点，他过去曾诱骗外甥女为妾。他的外甥凌德源就因这双重关系而一直受到重用，这次随着来汉，位置是行营经理处长，他一到汉口就因在当时汉口的所谓“交际花”华香琳那里争风吃醋和杨的秘书长蒋镇东发生冲突。凌借故向杨告了蒋镇东一状，杨就斥责了蒋一顿。蒋在一上任的时候，就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只好辞职回南京，投奔到杨的敌人叶蓬那儿去了。这事在南京传开了，伪府中人对杨颇多不满。杨除了陈璧君那条路子以外，在南京别无其他有力的支援了，即使陈璧君对杨也只是交易关系，尽管杨的姨太太（凌德源之妹，即杨的外甥女）拜结陈璧君作干女儿，陈也并不把杨看作死党。杨为了打开出路，只好一面授意凌德源辞职离开湖北，一面电请汪伪另派秘书长。这样南京方面就派了鄂籍的伪立法委员吴明浩来接任蒋镇东遗下的秘书长职务，算是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

当时日伪省府方面有几个由日本人推荐的厅处长，其中财政厅长陈维政入地生疏，野心不大，对杨还表示恭顺。至于宣传处长吕东荃、警务处长王达和教育厅长何庭流却结成一个小集团，一般人称他们为“青年党”一系（实际上只何庭流是青年党人），他们和特务部中中层以下的日本人勾结得较密，总想伺机而动取代杨揆一，因为陈维政不和他们一致行动，所以首先想夺取财政厅长的职位（吕东荃在来湖北以前，曾任日伪河南省府的财政厅长）。碰巧1942年夏天，财政厅内发生了一起科员罗某伪造支付命令盗窃4万余军票的案件，但盗窃未遂，就被破获了。吕东荃等就对陈维政等大肆攻击，但是陈因和日本特务部前任部长落合甚九郎的关系很深（这时落合甚九郎调任旅团长，后来兵败死于湖南，曾将陈托给继任的落合鼎五），同时他在日伪财政厅也根本没有嫡系的私人来任用，这次案件很容易证明和他并无什么特别牵连，只是由于制度不严，主管科长刘纯伯失察而已，因此陈的地位并未动摇。杨揆一看到陈很恭顺，正好利用他来打击吕东荃一系。吕、王、何这一小